

评 论

回顾与前瞻: 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南华侨华人研究综述

潘能梅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界在越南华侨华人史、归侨、华侨华人经济、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及社会文化事业的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存在研究主体泛化、内容片面、缺乏时新、视角与研究方法单一的不足。未来可细化研究对象,关注新移民、明乡人、华裔青年和南部以外的华人,重点考察21世纪以来华人社会的最新现状,拓展华人天主教信仰研究,尝试横向研究视角,倚重比较法、田野调查法的运用。

关键词:越南;华侨华人;明乡人;新移民

作者潘能梅,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华侨华人。地址:南宁市,邮编530000。

2019年越南人口与住房普查报告显示,越南现有华族人口749466人^①。据学者估计,1970年代至2008年,从中国前往越南的新移民总数为10—15万人^②。越南华侨华人为中越社会发展及两国间的友好交流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世界华侨华人的有机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界在越南华侨华人史、归侨、华侨华人经济、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华侨华人社会文化事业的研究中取得了新的进展,本文拟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回顾与梳理,并提出未来可进行拓展的研究方向。

一、越南华侨华人史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界在越南华侨华人史研究上主要关注基本概念的厘定、华侨华人的历史地位、当代华侨华人社会现状等问题,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

(一)基本概念的厘定

“华侨”与“华人”是越南华侨华人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其界定与辨析对越南华侨华人史研究的上限与范围有着直接的影响。在中国,学界对“华侨”“华人”的定义与辨析达成了基本共识,即“华侨是指定居

^①Ban chỉ đạo Tổng điều tra Dân số và Nhà ở Trung ương, Kết quả Tổng điều tra Dân số và Nhà ở Thời điểm 0 giờ Ngày 01 tháng 4 năm 2019, Hà Nội: Nxb Thống kê, 2019, tr. 160.(中央人口与住房普查指导委员会:《2019年人口与住房普查报告(截至2019年4月1日0点)》,河内:统计出版社,2019年,第160页。)

^②庄国土:《世界华侨华人数量和分布的历史变化》,《世界历史》2011年第5期。

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华人指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原中国公民及其外国籍后裔、中国公民的外国籍后裔”^①，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保留中国国籍。因此，“华侨”与“华人”是严格的法律概念，其产生的前提是华侨或华人的居留地为独立的国家。据此，学者们认为，虽然自秦朝起，内地人就已向时称“交趾”或“安南”的越南北部迁居，但此时的“交趾”“安南”为中国的郡属，内地人的迁移应视为一国之内的人口流动，不可称为“华侨华人”，因而越南华侨华人史研究的上限应追溯至越南独立建国的968年^②。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基于对“华侨华人”之“华”的解读，提出“华侨华人”应被赋予中华多元民族成份的内涵，将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纳入研究范围，避免“汉族才是华侨华人”的“一元民族成份论”^③。在这一框架下，部分学者的研究厘清了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向越迁移的时间、成分、过程、原因、人数和历史贡献^④。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越南华侨华人不应涵盖通过边界进入越南、跨界而居的少数民族，因为“他们并没有直接融入越南的华侨社区，而是逐渐融入越南境内的少数民族族群之中”，“形成两个或数个不同的民族”^⑤。

在概念的厘定上，越南学界持有不同看法。越南学者将华人定义为“长期居留当地，取得居住国国籍，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中华传统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并自认为‘华人’的汉族或被汉化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华侨则是与华人有着共同民族渊源但不持有当地国籍的群体”^⑥。由此可见，在“华侨”与“华人”的辨析上，越南与中国学者均以国籍归属为界分；在“华人”概念的界定上，除法律标准外，越南还加之以文化与自我认同标准。但越南学者并不依据这一法律标准界定史学研究的上限，而将秦汉时期内地人的南迁视为华侨华人史的开端。同时，“华人”的定义排除非汉族，而只承认“汉族或被汉化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

（二）华侨华人的历史地位

华侨华人对中越两国尤其是越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独立与解放事业作出了诸多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政治方面，“越南立国之初就有意识地利用移居华人治理国家的经验和知识巩固自己的独立”，因而封建时代不少华侨华人英杰得以入仕越南，“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贡献良多”^⑦。华侨华人对越南各个时期的经济贡献十分显著，“封建时期华人的经贸活动助使越南经济更为活跃，满足了当地人的消费及商品进出口需求”^⑧；“17至18世纪，华人为越南的外贸发展做出了贡献”，“是越南同区域及世界各国经贸交流的重要中介力量”^⑨。此外，华侨华人对越南的农业、矿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亦发挥了促进作用

①张秀明：《华侨华人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6年第2期。

②相关研究包括但不限于，李白茵：《越南华侨与华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页；徐善福、林明华：《越南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0页。

③向大有：《“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三十而立的回顾（1986—2017）》，《八桂侨刊》2017年第4期。

④向大有：《试析广西迁徙越南的少数民族华人》，《八桂侨史》1989年第1期；石维有、许彩盞，《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与广西边疆社会稳定的历史考察》，《贺州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向大有：《越南封建时期华侨华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⑤徐善福、林明华：《越南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2页，第134—135页。

⑥Châu Thị Hải, Người Hoa ở Việt Nam và Đông Nam Á: Hình ảnh Hôm qua và Vị thế Hôm nay, Hà Nội: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2006, tr. 39-40. (周氏海：《越南与东南亚的华人：昨日形象与今日地位》，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9—40页。)

⑦徐善福、林明华：《越南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2页，第134—135页。

⑧Trần Thị Thanh Thanh, Trương Anh Tài, Góp thêm Nhận định về Giao lưu Kinh tế Việt Hoa ở Việt Nam thời Phong kiến, Tạp chí khoa học trường Đại học Sư phạm TP Hồ Chí Minh, tập 14, số 5 năm 2017. (陈氏青青、张英才：《封建时期越华经济交流探析》，《胡志明市师范大学科学杂志》2017年第5期。)

⑨Châu Thị Hải, Người Hoa ở Việt Nam và Đông Nam Á: Hình ảnh Hôm qua và Vị thế Hôm nay, Hà Nội: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2006, tr. 192. (周氏海：《越南与东南亚的华人：昨日形象与今日地位》，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92页。)

用^①。法属时期,华人促使越南经济发展成为规模经济^②。后法属时代,北方华人“为恢复、改造和发展越南北方的国民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③,南方华人的经贸活动则使越南经济走上现代化道路^④，“他们在南越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所起的作用,都是以前所无法比拟的”^⑤。越南革新开放以来,华人的经济活动十分活跃,在国家现代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助使越南经济逐步融入区域与世界经济。除了政治与经济贡献,历史上中国和越南在文化、建筑、艺术及手工业方面均有交流与融合,“中华文化对越输出有官方途径与民间途径之分,其中民间途径是通过华人实现的”^⑥。此外,华侨华人为祖籍国及居住国的革命与独立解放事业亦功勋卓著^⑦。

(三)当代华侨华人社会现状

研究者普遍认为,越南实行革新开放以来,华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地位已得到改善。如莫唐指出,越南的民族政策承认华人具有与京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平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⑧。蚁团也强调,华人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公民,国家宪法和刑法保障华人当家作主及平等的权利”^⑨。但也有诸多学者注意到当代越南华人地位的非对称性。黄云静认为,“目前华人地位的改善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其他领域的平等权益还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限制,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⑩;陈衍德也指出,“客观环境使(越南)华人的政治地位提升缓慢,华人的政治参与很有限,华人的公民权利真正完全实现尚需时日”^⑪。赵卫华分析,“这是由越南既要利用华人发展经济又对华人心存疑虑这一矛盾逻辑决定的”^⑫。尽管如此,一些研究者对华人政治地位的持续改善持乐观态度,如覃翊提出,越南政府日渐重视发挥华人的作用,其政治地位将继续得到改善,而随着华人经济实力的日益提升,其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也会日益增长^⑬。

①龙永行:《17—19世纪越南华侨的移居活动与影响》,《东南亚研究》1997年第6期。

②Châu Thị Hải, Người Hoa ở Việt Nam và Đông Nam Á: Hình ảnh Hôm qua và Vị thế Hôm nay, Hà Nội: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2006, 277。(周氏海:《越南与东南亚的华人:昨日形象与今日地位》,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77页。)

③李白茵:《华侨与越南北方解放初期的经济建设》,《八桂侨史》1987年第1期。

④张秀明:《华侨华人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6年第2期。

⑤黄滋生,温北炎主编:《战后东南亚华人经济》,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6页。

⑥Phạm Đức Dương, Châu Thị Hải chủ biên, Bước đầu Tìm hiểu sự Tiếp xúc và Giao lưu Văn hóa Việt Hoa trong Lịch sử, Hà Nội: Nxb Thế Giới, năm 1998, tr.28。(范德阳、周氏海主编:《历史上华越文化接触与交流初探》,河内:世界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⑦相关研究参见周兴樑:《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越南华侨》,《贵州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向大有:《越南华侨华人抗日斗争的特征及贡献》,《八桂侨刊》2015年第4期;范德伟:《越南华侨与戊申云南河口起义》,《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李白茵:《越南华侨与华人》,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99—135页。

⑧Mạc Đường, Xã hội Người Hoa ở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sau năm 1975, Hà Nội: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tr.25。(莫唐:《1975年后胡志明市的华人社会》,河内:科学社会出版社,第25页。)

⑨Nghị Đoàn, Truyền thống Cách mạng của Đồng bào Hoa,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Nxb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năm 1987, tr. 34。(蚁团:《华人同胞的革命传统》,胡志明市:胡志明市出版社,1987年,第34页。)

⑩黄云静:《1959年以来胡志明市华人工作机构变迁——越南共产党华人政策与华人地位变化管窥》,《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9年第3期。

⑪陈衍德:《从排斥到接纳:越南华人政策的转变——1975年以后民族关系变动中越南华人的处境》,《世界民族》2008年第6期。

⑫赵卫华:《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华人政策的调整与实践》,《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⑬覃翊:《当代越南华人社会研究》,《世界民族》2009年第2期。

二、越南归侨

20世纪70年代末越南排华时归国的华侨曾被安置于广东、广西、福建、云南等省份的86个(后撤并为84个)华侨农林场。21世纪以来,越南归侨的再流动、认同和社会适应等问题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以为其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反思安置工作的得失提供依据。

(一)再流动

一些华侨在归来后的不同时期离开了集中安置点,研究者常采用“推拉模型”来解释他们再流动的原因。凭祥归侨是越南归侨在国内迁移的典型案列,其中推力因素包括凭祥归侨对农林场的生活不适应、华侨农林场改革引发的失业危机及与农场内其他群体的疏离,拉力因素指凭祥丰富的就业机会、包容开放的社会氛围及归侨的社会网络,中间因素包括对迁移距离较近,能获取政府补贴及越南语优势的考虑^①。广州市近邻某华侨农场的越南归侨则选择迁往国外,当时国内外环境的推拉因素、归侨的过客心态和冒险精神等中间因素使得他们在归来不久后又选择了跨国流动^②。

(二)认同

地理与社会空间的转换及排华的切身经历往往带来归侨个人或群体认同上的改变或固化。广州近邻某华侨农场越南归侨早期跨国再流动带来的重要影响之一即是其身份认同出现多重性特征^③。广西防城港企沙镇华侨渔村的越南归侨具有不同于当地民众的“边缘化”族群认同,而这一“边缘化族群认同”与“边缘化”本身具有互促进作用^④。广东省小岭华侨农场的越南归侨则在被边缘化的过程中建构了“难民身份”的想象和认同,这是“以特殊迁移经历中被群体内化与重构的苦难历史记忆、政府倾斜性扶持政策及现实利益为媒介而实现的”^⑤。同时,归侨的认同并不是恒定、单一的,其具有动态变化性与多元性。广西来宾华侨农场的研究显示,归侨的归属感是波动的,他们在与当地族群的互动中加深了对当地的认同^⑥。广西东兴的散居归侨则由于职业、居住时间、个人经历的差异,对东兴呈现出多元化的地域认同^⑦。

(三)社会适应

越南华侨的回归必然需要面临社会再适应,现有研究案例表明,尽管过程曲折,但在自身的努力调适及安置政策调整的叠合作用下,越南归侨已逐渐适应并融入当地社会。广西十万山华侨农场的越南瑶族归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计受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综合影响,生计的变迁引发了其对物质与精神文化的适应,面对1990年代以来新一轮的生计变化,需要政府对该群体的就业困难给予更多关注^⑧。广东小岭

①李海翔:《归侨再迁移研究——以广西凭祥市为例》,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②姚俊英:《越南归侨早期跨国再流动的人类学研究——以广州市近邻H华侨农场YH越南归侨社区为例》,《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③姚俊英:《越界:广州H华侨农场越南归侨跨国流动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④蒋婉:《“边缘化族群”的认同——以广西防城港企沙镇华侨渔村归难侨为例》,《八桂侨刊》2012年第2期。

⑤孔结群:《难民认同:基于苦难历史记忆、政策及现实利益的想象——以广东省小岭华侨农场越南归侨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⑥陈云云:《“他乡”与“家乡”:归侨的归属感研究——以广西来宾市华侨农场归侨为例》,载郑一省主编:《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广西华侨农林场归侨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7年,第286页。

⑦叶英:《散居归侨地域认同研究——以广西东兴镇越南归侨为例》,载郑一省主编:《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广西华侨农林场归侨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7年,第358页。

⑧韦佳良:《瑶族归侨的生计变迁与文化适应研究——以广西十万山华侨农林场为例》,载郑一省主编:《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广西华侨农林场归侨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7年,第218—219页。

华侨农场越南归侨的本土关系建构则经历了从隔阂到友好的阶段,由此折射出他们从寄居者向定居者的转变趋势^①。

三、越南华侨华人经济

越南华侨华人在经济领域的活动最为活跃,因而一直是该国华侨华人研究的重要议题。

1980年代以来,研究者通常聚焦于华侨华人经济的历史地位、性质,探讨华侨华人经营获得成功的因素及其经济现状与发展趋势。由于华侨华人经济的历史地位已在第一部分综述,此处不再重述,以下将分述其余三方面的研究状况。

(一) 华侨华人经济的性质

学术界通常将越南华侨华人经济性质的研究整合至东南亚的整体框架中,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认为二战前的华侨经济为外来经济,随着战后各国华侨国籍的变更,华侨资本转变为当地的民族资本。如越南学者周氏海认为,“华人的经济特征与各历史时期社会性质的变化相关,在殖民时期,华侨资本是殖民地经济的一部分,东南亚各国独立后,由于在地化政策的实施,华侨资本转化为华人资本,成为居住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就华侨经济的形成过程及其在居住国的地位与作用而言,其在战前已是当地民族经济的构成部分。而战后华侨加入居住国国籍,则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法律上肯定了这一事实。郭梁指出,“华侨华人和当地劳动人民一样,是生产者阶级,是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劳动人民。华侨或华人资本,实际上成为当地民族资本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③

(二) 商业成功原因分析

学界普遍认为,越南华商之所以能取得经济发展上的成功,与其个人或群体的内在品质及外在利好条件密不可分。其中,内在品质包括华人素有经商传统、诚实守信、勤俭节约,以及拥有广泛的社会网络。如阮功成认为,“华人有做生意的经验和传统”^④,因而在经济领域较其他族群更容易获得成功。研究者一致认为华商秉持诚信在其商业活动中助益良多,越南学者周氏海将其定义为“信义”,并对此有较为详细的阐述。她指出,首先,信义是华人群体联结过程的核心,借此华人得以建立群体成员间、华人同当地人之间及不同国家华人间的信任,实现更大范围的联结;其次,信义是华人家庭和宗乡信用的基础,其犹如无字契约,摆脱了法律文书的繁文缛节,因而华人可以更高效地利用群体成员的闲置资本,亦可迅速大量集资;再次,信义是华商个人品质的组成部分,帮助华人成功营销;从次,信义使华人坚守一种职业,形成各自的行业优势,避免恶性竞争;最后,信义还被用以攀附政治势力,是华人经营成功的决定因素之一^⑤。朱桂莲则强调华人的勤俭与社会网络在其商业成就中的重要性,她指出,“华侨善于节约,对于业务更内行、更勤勉、更有组织性”,“无组织的商人很难同他们竞争”^⑥。除内在品质外,一些研究者指出,前殖民时期居住国政

①孔结群:《越南归难侨的本土关系建构历程——基于广东小岭华侨农场的个案分析》,《南方人口》2012年第1期。

②Châu Thị Hải, Người Hoa ở Việt Nam và Đông Nam Á: Hình ảnh Hôm qua và Vị thế Hôm nay, Hà Nội: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2006, tr. 279. (周氏海:《越南与东南亚的华人:昨日形象与今日地位》,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79页。)

③郭梁:《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1页。

④阮功成:《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的华人共同体》,《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⑤Châu Thị Hải, Người Hoa ở Việt Nam và Đông Nam Á: Hình ảnh Hôm qua và Vị thế Hôm nay, Hà Nội: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2006, tr. 347-351. (周氏海:《越南与东南亚的华人:昨日形象与今日地位》,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47—351页。)

⑥朱桂莲:《近代越南经济的发展与华侨》,《武汉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权给予华裔的优待及当地人向来缺乏从商的传统和便利是华人占据商业优势的有利外源条件^①。

(三) 华侨华人经济现状与发展趋势

越南华人经济在1975年越南南北统一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及其后的排华运动中遭受重创,至1986年革新开放后才得以逐渐复苏。覃翊认为,当前越籍华人经济呈现出“从传统的单一经营向多元化、集团化发展”的显著特点,“一些华人企业发展成为具有雄厚实力的大型财团”^②;黄滋生等人亦持相似的观点,指出股份化、集团化、多元化经营及以先进技术和方法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新动力是越南华人经济的发展趋势^③;然而,虽然越南华人经济在革新开放以来得到重振,但其依然面临诸多困境,实力尚且有限。衣远认为,因为前一阶段遭遇重创,华人几乎白手起家,因而“基础依旧薄弱”;不少华人担心政府政策朝令夕改,因而多投资“周转快,易抽手”的中小项目,“制约了华人经济规模的扩大”;而对政治的疏离也使华人“缺乏诸多重要的政治和社会资源”^④。杨然指出,胡志明市当地华人的经济规模较小,在融资方面存在困难^⑤。潘安对胡志明市革新开放以来华人经济的考察发现,小手工业和商贸服务业是华人最主要、最集中的行业,华人的经济潜力还有待激发^⑥。陈衍德也指出,虽然1986年以后越南对待华人的政策出现转变,但华人经济一直未能恢复到1975年以前的水平^⑦。周氏海则比较了越南华人与东南亚其他国家华人的经济规模与潜力,认为越南华人的经济潜力不大^⑧。展望未来,研究者对越南华人经济的发展持谨慎的乐观。如黄滋生等人认为,“越南目前实行的革新开放政策,包括华人政策是不可逆转的”,“对华人经济抱有信心,是符合逻辑的”^⑨。赵和曼对此的观点是,越南华侨华人今后在振兴该国经济中的作用会进一步发挥,未来是光明的,但道路不可能是平坦的^⑩。

四、越南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华侨华人在越南的处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国际关系的影响不容忽视,其既包括中国与越南的双边关系,也涵盖不同时期越南同关涉该国事务之各国家地区及国际多边关系,学界关于国际关系对越南华侨华人处境及越南华侨华人政策之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封建时期、二战

①参见蒋国学:《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后期越南南河海外贸易中的华商》,《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2期;邱普艳:《越南阮氏政权对华贸易中的华人》,《世界民族》2008年第5期;Trương Quốc Học, Tổng Quốc Hưng, Dương Văn Huy, Sự hình thành Cộng đồng người Hoa và Hoạt động Thương mại của Hoa thương ở Hội An thế kỷ XVI-XVIII, Nghiên cứu Đông Nam Á, số 3 năm 2007; Nguyễn Trọng Văn, Mai Phương Ngọc, Quan hệ thương mại của Đảng Trong với người Hoa thế kỷ XVI-XVIII, Nghiên cứu Lịch sử, số 9 năm 2009; Dương Văn Huy, Hoạt động kinh tế của người Hoa ở Hội An thời kỳ các chúa Nguyễn, Nghiên cứu Lịch sử, số 4 năm 2010。(蒋国学,宋国兴,杨文辉:《16—18世纪会安华人社会的形成及华商的贸易活动》,《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3期;阮仲文,梅芳玉:《16—18世纪内路与华人的贸易关系》,《历史研究》2009年第9期;杨文辉:《阮主时期会安华人的经济活动》,《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

②覃翊:《当代越南华人社会研究》,《世界民族》2009年第2期。

③黄滋生,温北炎主编:《战后东南亚华人经济》,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5页。

④衣远:《试析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华人经济新发展》,《东南亚纵横》2013年第11期。

⑤杨然:《越南胡志明市的华侨华人社会》,《东南亚纵横》1996年第2期。

⑥Phan An, Người Hoa ở Nam bộ,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năm 2005, tr.38。(潘安:《南部的华人》,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8页。)

⑦陈衍德:《从排斥到接纳:越南华人政策的转变——1975年以后民族关系变动中越南华人的处境》,《世界民族》2008年第6期。

⑧Châu Thị Hải, Người Hoa ở Việt Nam và Đông Nam Á: Hình ảnh Hôm qua và Vị thế Hôm nay, Hà Nội: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2006, tr. 276。(周氏海:《越南与东南亚的华人:昨日形象与今日地位》,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76页。)

⑨黄滋生,温北炎主编:《战后东南亚华人经济》,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7页。

⑩赵和曼:《越南华侨华人在振兴该国经济中的作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后至革新开放前和革新开放后三个时期。

(一)封建时期

自968年越南独立建国至1567年中国明朝中期海禁开放,华人虽持续不断移居越南,但人数十分有限,越南历朝的华侨华人政策尚在建立与完善中,至阮朝时才渐臻成熟。各学者的研究显示,封建时代,越南对华侨华人的态度及政策主要受制于统治者的利益及中越关系。如向大有指出,越南历代华侨华人政策以安抚利用和控制镇压兼施并举为原则,虽因时因事因人而各有侧重,但其出发点与归宿均在于谋求统治阶级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华侨华人生存环境和发展条件的升降起落同祖籍国的国力强弱及指导思想密切相关^①。蒋国学比较了17至18世纪南河与北河政权的华侨华人政策,认为相较于北河政权,南河阮氏实行对其自身和华侨华人而言均是积极、双赢的政策,导致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与中国的地缘距离及互动关系的不同^②。尤建设对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越南华侨华人政策的历时分析也显示,其主要依据国家利益而定,同时受中越关系等因素的影响^③。

(二)二战后至革新开放前

二战后越南的华侨华人政策曲折变迁,华人命运跌宕起伏,国际关系演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学界对该议题的研究可分为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

历时研究方面,闫彩琴考察了战后越南华人政策的演变历程,指出二战后中越关系经历“同志加兄弟”到“兵戎相见”“逐步改善”“平等互利”的螺旋式发展过程,华人地位的起伏亦与之呈正相关性,认为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中越关系对越南华人政策的影响更为明显^④。刘笑盈和于向东的研究进一步指出越南是国际冲突的热点,因而国内形势受国际局势的影响大于他国,作者还分析了华人问题与中越关系的互动关系,认为华人问题对中越关系的影响有限,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主要的方面是中越关系变化导致华人社会地位的升降起落和华人问题的尖锐化^⑤。

共时研究方面,主要聚焦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排华运动,研究显示,国内外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助推了此次事件,包括中越双边及地区和国际多边关系的变局,越南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换,越南民族主义的发展及中国“文革”等政治因素^⑥。关于国际关系演变在其中的促发作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都强调中越双边关系转恶和东南亚地区及全球多边关系变化的交互影响。如King C. Chen指出,此时的中越关系因东南亚、美国和苏联三重国际因素的影响变得复杂^⑦。近年来罗雪珍的研究较为详细地阐述了这一复杂的互动关系,首先是中越关系转恶。越南抗美战争胜利后,中国的援助对越南而言已不再迫切,而越南欲谋求印支霸权的图谋遭到中国的反对,双方分歧日渐扩大。其次是地区与国际多边关系的影响。1960年代中期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极力拉拢越南以削弱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而此时美国在越战中的失利使其在东南亚的影响力锐减,中国便成为苏联进入东南亚和越南谋求地区大国企图的共同障碍,由此促成了越苏

①向大有:《越南封建时期华侨华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336页。

②蒋国学:《论越南南河阮氏政权的华侨华人政策——兼论北河黎郑政权的华侨华人政策》,《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③尤建设:《试析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越南封建政府的华侨华人政策》,《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④闫彩琴:《二战后越南华人政策演变探析》,《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6期。

⑤刘笑盈,于向东:《战后越南华人四十年历史之变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⑥罗雪珍:《越南排华运动(1975年—1986年)的原因探析》,《红河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⑦King C. Chen, *China's war with Vietnam, 1979, issues, decisions, and implications*,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87, p.155.

的合作。通过排华,越南旨在达到反华及巩固苏越关系的目的^①。但在这一多边互动关系中,各方对越南排华的促发作用并不是均衡的,陈衍德认为,其以越南、中国和苏联三角关系的影响最为重要,还包括国际形势对该事件的作用机制,即在国际因素影响下由国内形势的变化促成^②。

(三)革新开放后

越南统一后推行的大规模排华、社会主义改造及地区霸权主义使其面临严重的内外交困。1986年,越南开始实行革新开放,对内致力于发展经济,同时将华人问题纳入民族事务的处理范畴,改善华人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地位,对外寻求国际关系的改善,并于1991年实现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华人也开启融入越南社会的进程。有学者认为,随着中越关系正常化和华人在地化的完成,中越关系对华人问题的影响将逐渐淡化,越南对经济发展的考量将成为目前及未来决定其华人政策的首要因素^③。但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持更谨慎的意见。黄小坚对1975—1993年间华人经济形势变化的考察显示,华人经济重建仍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取决于越南国内政策的今后走向,中越两国关系的发展情形,并受到区域和世界经济形势的深刻影响^④。陈衍德更全面地指出,中国因素从正反两方面作用于华人问题,中越两国虽然已实现关系正常化,但包括领土、领海争端在内的一系列矛盾并未彻底解决,此后,中越关系虽总体发展顺利,但干扰和麻烦仍不少,这都会影响越南对华人的接纳^⑤。

五、越南华侨华人社会文化事业

学界对越南华侨华人社会文化事业的研究涵盖宗教信仰、社团组织、华文教育与华文报业。

(一)宗教信仰

越南华人既信奉佛教、道教、天主教、福音教等制度化的宗教,又崇拜天后、关公、财神等民间信仰神明,且呈现出宗教与信仰相杂糅的特点。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华人在地化的逐渐完成,作为华人民族文化显性标识的宗教信仰得到学者的关注,并在基础研究、功能与融合变迁问题上积累了一定的成果。基础研究方面,潘安的《胡志明市的华人庙宇》^⑥及陈红莲的《南部的华人文化:宗教与信仰》^⑦厘清了胡志明市与南部华人主要宗教信仰宫庙的肇建历史、时间、奉祀神明、空间布局及信仰实践等基本问题。阮玉诗在《西南部的天后信仰》中研究了西南部华人天后信仰的分布特点、建筑艺术特色、组织机构与信仰活动,发现祭祀建筑、神明结构与信仰活动的方言群差异,其中广东方言群体现出统一性和官方性,潮州方言群具有灵活与非官方性,客家与海南方言群则介于上述两者之间^⑧。关于华人宗教信仰的功能,一些研究

①罗雪珍:《越南排华运动(1975年—1986年)的原因探析》,《红河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②陈衍德:《从排斥到接纳:越南华人政策的转变——1975年以后民族关系变动中越南华人的处境》,《世界民族》2008年第6期。

③Ramses Amer, *The ethnic Chinese in Vietnam and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 Kuala Lumpur, 1991, p. 123-124.

④Huang Xiaojian,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the Vietnamese Chinese Economy, 1975-1993, The last half century of Chinese overseas*, edited by Elizabeth Sin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62.

⑤陈衍德:《从排斥到接纳:越南华人政策的转变——1975年以后民族关系变动中越南华人的处境》,《世界民族》2008年第6期。

⑥Phan An, *Chùa Hoa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Nxb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năm 1990.*(潘安:《胡志明市的华人庙宇》,胡志明市:胡志明市出版社,1990年。)

⑦Trần Hồng Liên. *Văn hóa người Hoa ở Nam Bộ: Tôn giáo và Tín ngưỡng*, Hà Nội: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năm 2005.(陈红莲:《南部的华人文化:宗教与信仰》,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⑧Nguyễn Ngọc Thơ, *Tín ngưỡng Thiên hậu vùng Tây Nam Bộ*, Hà Nội: Nxb Chính trị Quốc gia Sự thật, năm 2017, tr. 372.(阮玉诗:《西南部的天后信仰》,河内:国家政治真相出版社,2017年,第372页。)

案例指出,宗教信仰是华人的精神寄托^①,为华人社会提供了物质帮助,调节着教育、医疗等社会功能^②,在保存族群文化^③,凝聚社群,教育社群成员不忘本源、重视情义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丰富了华人聚居地及整个越南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具有历史、文化及旅游价值^④。在当代,变迁中的宗教信仰还兼具跨种族交流与融合的功能^⑤。此外,依托宗教信仰的桥梁作用,可以改进国家层面的交流模式,促进民心相通^⑥。由于主体、自然、社会、经济和历史环境等原因,华人的宗教信仰亦在传承中演绎融合与变迁。一些以天后信仰为对象的研究显示,其在祭祀建筑、装饰、传说、仪式、庙会方面融入了越南文化元素,天后亦由海神转变为海神、母神与福神神格兼具的神灵^⑦。阮玉诗对西南部天后信仰的研究则以丰富的田野资料进一步揭示该地域华族、越族及高棉族文化融合与变迁的双向性^⑧。

(二) 社团组织

历史上,越南华人曾以血缘、地缘、神缘、业缘及文缘为纽带结社。许多研究指出此类社团组织对于华人社会的积极作用。如黎瑞红燕归纳了18—19世纪时华人帮会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包括分配各帮的经营领域,建构经营网络,组织及管理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流通,提供居住国的经济、政治与社会信息,建立社团活动基金^⑨。除经济作用外,华人社团的主要载体——会馆常具有联络乡谊及慈善的社会职能^⑩。而诸如宗亲和乡族一类的组织则有助于华人实现守望相助,保留中华传统文化及构建和巩固信用机制以达成更紧密的社会联结^⑪。但也有学者注意到华人社团固有的消极面,如周氏海论述道,一方面华人社团组织具有封闭性与独立性,造成华、越及不同方言群间华人的区隔;另一方面,华人社团保留族群文化,培养华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落叶归根的意识,阻碍华人融入当地社会;同时,华人社团依靠神权存在和

①Phan An, Tục thờ cúng Bà Thiên Hậu của người Hoa ở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Nghiên cứu Tôn giáo, số 3, năm 2002. (潘安:《胡志明市华人的天后信仰》,《宗教研究》2002年第3期。)

②Trần Hồng Liên. Văn hóa người Hoa ở Nam Bộ: Tôn giáo và Tín ngưỡng, Hà Nội: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năm 2005, tr. 25-26. (陈红莲:《南部的华人文化:宗教与信仰》,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5—26页。)

③Đào Vĩnh Hợp, Võ Thị Ánh Tuyết, Cộng đồng người Hoa Ven biển miền Trung trong Giao lưu Văn hóa, hội nhập và phát triển, Tạp chí Phát triển Khoa học và Công nghệ, số 4, năm 2018. (陶永合, 武氏映雪:《中部沿海的华人:文化交流融合与发展》,《科技发展》2018年第4期。)

④Võ Duy Nghĩa, Một số loại hình Tín ngưỡng Tiêu biểu của người Hoa ở Hội An, Quảng Nam, HNUE Journal of Science, số 2 năm 2019. (武唯义:《会安华人的典型信仰类型》,《河内师范大学科学杂志》2019年第2期。)

⑤阮玉诗,阮俊义:《天后上天与回家——越南金瓯华人天后信仰的变迁与在地化》,《妈祖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阮玉诗:《越南华人信仰文化的解构与增权:以关公与天后信仰为例》,《华侨华人文学学刊》(第五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⑥林明太:《妈祖文化在越南的传播与交流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⑦Võ Duy Nghĩa, Một số loại hình Tín ngưỡng Tiêu biểu của người Hoa ở Hội An, Quảng Nam, HNUE Journal of Science, số 2 năm 2019. (武唯义:《会安华人的典型信仰类型》,《河内师范大学科学杂志》2019年第2期。)

⑧Nguyễn Ngọc Thơ, Tín ngưỡng Thiên hậu vùng Tây Nam Bộ, Hà Nội: Nxb Chính trị Quốc gia Sự thật, năm 2017, tr. 372, tr. 306-321. (阮玉诗:《西南部的天后信仰》,河内:国家政治真理出版社,2017年,第306—321页。)

⑨Lê Thụy Hồng Yến, Vai trò Các bang, hội quán đối với Hoạt động Kinh tế của người Hoa ở Nam bộ(thế kỷ XVIII - thế kỷ XIX), Tạp chí Khoa học ĐHQSP TPHCM, số 52 năm 2013. (黎瑞红燕:《18—19世纪华人帮会和会馆在南部华人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胡志明市师范大学科学杂志》2013年第52期。)

⑩Đặng Hoàng Lan, Chức năng và Vai trò của miếu Nhi Phủ trong Đời sống Kinh tế Xã hội của người Hoa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Tạp chí Khoa học xã hội, số 2 năm 2015. (邓皇岚:《二府庙在胡志明市华人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职能和作用》,《社会科学杂志》2015年第2期。)

⑪Châu Hải, Các nhóm Cộng đồng người Hoa ở Việt Nam, Hà Nội: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năm 1992, tr.72. (周氏海:《越南的华人社群》,河内:科学社会出版社,1992年,第72页。)

发展,可以凝聚群体成员,但也会造成隔阂^①。

(三) 华文教育与华文报业

研究者对于越南华文教育事业的考察集中在历史与现状上。李白茵指出,受到政局演变的巨大影响,越南的华文教育经历了振兴(1907—1929年)、发展(1930—1953年)和衰落(1954—1975年)时期^②。衣远认为,当前,华教事业未能恢复全盛时的局面,但已呈现出复苏发展的趋势。与以往不同的是,其兴办形式更为多元与个性化,且在原有民族性的基础上增添了功利性与开放性^③。更多研究关注的是当前华文教育存在的不足,包括管理层不谙华语,管理欠科学;办学经费紧张;教学场地受限,设备简陋;师资缺口大,质量不高;教材紧缺,品质参差不齐;学时不足;高中和大学阶段无华语课程,教学缺乏连续性^④。学界对越南华文报业的关注较少,一些研究指向历史与现状,归纳出越南华文报纸所经历的华人自办、华人自办与官办同时存在和完全官办的三个时期。当前,越南华文报纸在越南华人的身份认同中发挥着双重作用,其既是建构越南华人国家认同的工具,又是传承华人民族文化、维系族群意识的载体^⑤。

六、总结与评述

(一) 既有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第一,研究主体泛化。现有成果常以越南或某一地域的华侨华人为对象作同质的统一考察,然而越南华侨华人社会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移民时间、年龄、地域等差异,因此,细化研究对象,关注新移民、明乡人、华裔青年和南部以外的华人将有助于深化对越南华侨华人社会共性与特性的理解。

第二,研究内容滞后,缺乏对当下最新情况的研究。在前文述及的专题中,社会文化事业专题对民间信仰中的天后和关公崇拜研究密集,对宗教崇拜的考察较为单薄。此外,除归侨外,其余四个专题的研究内容均普遍关注中越关系正常化前的历史,对21世纪以来的最新现状缺乏研究。

第三,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单一。既有成果普遍关注纵向的历史演变而忽视横向联系,一些议题如新移民、华人与明乡人之间的互动,华侨华人社团网络研究,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联系,宗教信仰圈的研究鲜有学者涉足。就方法而言,研究者多仰赖历史文献进行质性研究,比较法、田野调查法运用匮乏。在比较法研究视野下,新移民与华人、华裔青年与老一辈华人、不同地域华人之间的异同比较将是具有价值的研究议题;而田野调查法的使用则有助于改善当前研究缺乏一手资料的现状,尤其适用于素材稀缺的新移民研究与当代华人社会现状研究。

(二) 未来研究可拓展之处

1. 新移民研究。前文述及,有学者推估1970年代至2008年,从中国前往越南的新移民总数为10—15万人,覃翊曾分析其移民的原因、构成及未来发展前景^⑥,但职业分布,社会适应,与当地华人、越南人、地方

^①Châu Thị Hải, Người Hoa ở Việt Nam và Đông Nam Á: Hình ảnh Hôm qua và Vị thế Hôm nay, Hà Nội: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2006, tr. 124-125. (周氏海:《越南与东南亚的华人:昨日形象与今日地位》,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24—125页。)

^②李白茵:《越南华侨教育事业的兴衰》,《八桂侨史》1989年第1期。

^③衣远:《越南华文教育发展现状与思考》,《东南亚纵横》2014年第7期。

^④Huỳnh Ngọc Trảng, Đặc khảo Văn hóa người Hoa ở Nam Bộ, Hà Nội: Nxb Văn hóa Dân tộc, năm 2012, tr. 424-428. (黄玉嫦:《南部华人文化特考》,河内:民族文化出版社,2012年,第424—428页。)

^⑤易文,赖荣生:《越南华文媒体:历史、现状与前景》,《东南亚纵横》2009年第12期;易文:《越南华文报纸在越南华人身份认同中的双重角色——基于华文〈西贡解放日报〉记者杨迪生新闻作品集〈走进堤岸〉的文本分析》,《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⑥覃翊:《当代越南华人社会研究》,《世界民族》2009年第2期。

政府及祖籍国的互动,社团网络、婚姻家庭、后代教养等问题未曾涉及,而新移民与华人在教育程度、职业选择、工作技能与成就等方面的比较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2.明乡人研究。截至目前,学界对明乡人的研究多仰赖历史文献,缺乏对口述资料及会馆规章、纪要等一手材料的开发利用,尚未有研究深入涉及当代明乡人的现状,触及族群中个体的主观意识与认同,因此在研究结论上出现与事实不符的偏差,认为明乡人已完全越化,不再保有族群意识。笔者的田野调查发现^①,胡志明市明乡人称他们是陈上川部的后裔,奉祀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供奉明乡族群的先祖前贤,定期祭祀,形成了有别于京族、华族的文化特征,并在主观上认同明乡身份。因此,对当代明乡人的族群文化、族群互动与族群意识的研究将有可能更新目前的研究结论,并为深入的比较研究与变迁研究奠定基础。

3.华裔青年研究。越南学者潘安的初步研究显示,华裔青年与老一辈华人在社会融入、教育程度、职业技能、公民意识、婚姻家庭观方面均存在差异^②,但未涉及两者对祖籍国的情感、职业观、教育观、文化信仰等问题的比较,华裔青年将成长为华人社会的主力,代表新的发展趋势,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4.南部以外的华人研究。目前绝大多数的研究成果集中于南部尤其是胡志明市的华人研究,这与越南华人的地域分布呈正相关。但除南部外,北部北江、中部平顺、西原林同亦是华人的聚居地^③,而这些地区华人的生计、文化、信仰、教育等问题鲜受关注。北部、中部、西原地区的自然环境、主要产业、经济发展条件、族群结构等均与南部存在显著差异,探明这些地域华人社会的状况并进行比较研究将有助于充分了解越南华人社会的共性与差异。

5.华人文化信仰研究。近年来,越南对华人的文化信仰研究较为充分,为国际学界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成果。但就宗教崇拜而言,华人的天主教崇拜尚停留在概述层面,胡志明市有10000人的天主教信众^④,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其形成历史、信仰实践、功能、特点、与民间信仰及其他宗教信仰的关系仍有可探讨的空间。此外,笔者在胡志明市及同奈的田野调查发现,南部各省华人的宗教信仰活动互动频繁,其与会馆组织、经济活动之间似乎具有某种相关性,未来可尝试探讨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责任编辑:郑春玲)

①此次田野调查的时间为2020年1月17日至2月6日。

②Phan An, Người Hoa ở Nam bộ,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năm 2005, tr.156-196. (潘安:《南部的华人》,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56—196页。)

③根据2009年越南人口与住房普查,三地华人人人口分别为18359、10243、14929,参见Ban Chỉ đạo Tổng điều tra dân số và nhà ở Trung ương, Kết quả toàn bộ Tổng điều tra Dân số và Nhà ở Việt Nam năm 2009, Hà Nội: Nxb Thống Kê, 2010, tr. 166, 195, 203.(中央人口与住房普查指导委员会:《2009年人口与住房普查报告(截至2019年4月1日0点)》,河内:统计出版社,2010年,第166页,第195页,第203页。)

④Phan An, Người Hoa ở Nam bộ,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năm 2005, tr.55. (潘安:《南部的华人》,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55页。)

(a form of indentured servitud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nd evading conscription. In contemporary times, reasons for migration also include family reunification, inheritance of property, studying abroad, marriage, and labor export. Yulin people are part of the global wave of migration.

Keywords: Guangxi; Yulin People; Migration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Remote Dutch Caribbean

.....GaoWeinong (63)

Abstract: In several islands of the Dutch Caribbean, scattered Chinese communities were already present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immigrant era, particularly on Curacao and Aruba. Other islands saw the arrival of Chinese immigrants only during the era of new migration, with some islands still having very few Chinese immigrants today. The Chinese immigrants on these islands primarily relocated through village-based networks during the new migration era. On these islands, they mainly engaged in businesses such as general stores, restaurants, and laundry services. Islands with larger Chinese communities typically established their own associations, although each island generally only had one "all-purpose" association. Dur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immigrant era, the Chinese in the Dutch Caribbean were almost isolated from the outside world, but by the time of the new migration era, they had established close connections with the outside world, including with their hometowns.

keywords: Dutch Caribbean; Overseas Chinese; Migration

Research on the Practical Logic and Path Selection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 [Malaysia] DongWenlong Samah Ali Mohsen Mofreh (73)

Abstract: 2024 marks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as well as the "China-Malaysia Friendship Year." Taking advantage of this important occasion, and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is study delves into the practical logic and path selection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This explor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Malaysia, enhancing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both countries' vocational education brands, promo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fostering cultural exchange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Keywords: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Logic; Pathways

Review and Outlook: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Vietnamese Overseas Chinese Since the 1980s

..... Pan Nengmei (82)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have made a series of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overseas Chinese in Vietnam,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the overseas Chinese economy,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ir involvem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affairs. However, there are some shortcomings, such as generalized research subjects, one-sided content, a lack of timely updates, and limited perspectives and research methods. Future research could focus on more specific subjects, such as new immigrants, Mingxiang people, overseas Chinese youth, and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outside the southern region of Vietnam.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examin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communities since the 21st century, expand research on Chinese Catholicism, and attempt a horizontal research perspective, relying more on the comparative methods and application of fieldwork methods.

Keywords: Vietnam; Overseas Chinese; Mingxiang People; New Immigrants; Research Outcomes